

論澳門文化的形成和歷史地位

黃鴻釗*

澳門貿易港從1557年形成，迄今已有440年的歷史。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，中西文化在這個港口城市交匯融合，結果形成了別具一格的澳門文化，並直接推動了16-18世紀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。今天，深入研究和闡述澳門文化形成及其歷史作用，仍然具有一定的意義。

一、澳門貿易港的建立

澳門港口開放與經濟的繁榮，是其文化形成與發展的歷史前提。從歷史上看，澳門本是香山縣境內一個荒僻的漁島，島上居民稀少，主要以打漁為生，但它同時又是古代珠江口的洋船舶口之一。當時除澳門外，其他船舶尚有：新寧（今台山）之廣海、望桐、奇潭；香山之浪白、十字門；東莞之虎頭門、屯門、雞栖等等¹。其中以澳門的地理位置最為優越。它背靠大陸，面向汪洋，處於進出省城的最佳位置，糧水供應又十分方便。於是，當1529年廣東巡撫林富上奏，請求開放海禁後，明朝便於1535年將市舶司移設澳門。從此，‘諸澳悉廢，而濠鏡獨為舶藪’²。開放之初，雖然停泊船隻甚多，但島上沒有房屋給商人留下來居住。對於這些商人，‘守澳官權令搭蓬栖息，殆舶出洋即撤去之’³。或者是：‘西洋之人往來中國者，向以香山澳為

*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

1. 黃佐：《廣東通誌》卷66外誌條。又見屈大均《廣東新語》卷2地語，廣東人民出版社，1991年版，第34頁。

2. 同上。

3. 龐尚鵬：《百可亭摘稿》卷1〈撫處濠鏡澳夷疏〉。

艤舟之所，入市畢，即驅之以去’⁴。因此在它開埠以後，至葡人到來之前，它仍然是很荒涼的。它的固有文化，是中國傳統的漁港文化。早在四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，澳門的先民就居住在這裏，生息繁殖。路環島考古發掘出來的彩陶盤，刻着許多水波紋，以及龍形岩畫等，都說明這裏的居民同海上生活的關係。此外，海神媽祖的信仰也在澳門十分流行。明朝弘治元年（1488年）閩潮商賈在澳門建造了媽祖廟，這座神廟是澳門漁港文化的象徵。葡人初來時曾在媽祖廟附近靠岸停泊，並據此稱澳門為馬交（Macau）。

16世紀中期葡人的到來，使澳門海島的地位發生根本的變化。1553年，葡人‘托言水濕貢物，願借地晾曬。海道副使汪柏徇賄許之。’⁵葡人獲准上岸暫住後，至1557年，又在島上大興土木，‘初僅蓬纍數十間，後工商牟利者始漸運磚瓦木石為屋，若聚落焉。’⁶這是葡人長期居留澳門的開始。中國政府默許葡人在澳門建造房屋居住，但規定其須按年交納地租。租金由香山縣負責徵收⁷。從葡人交租一事可以看出，直到1849年以前，澳門一向處於香山縣管轄之下。隨着葡人聚居澳門人數的增多，1560年葡人擅自建立了以兵頭、大法官和主教為首的機構，以維持居留地的社會秩序。但其權力僅限於葡人本身的商務和內部事務，仍必須遵守中國的法律，服從中國官員的管治。

與此同時，澳門開始成為一個國際貿易港。16世紀初葡萄牙壟斷了以香料貿易為中心的東西方貿易，把澳門作為它在遠東的國際貿易中轉站。由於當時中國政府奉行閉關政策，中國的對外貿易事實上被葡人所壟斷。他們在這種轉運貿易中大獲其利。但葡人仍要向中國海關繳納商稅。這也表明，它是在承認中國主權的前提下經營澳門貿易的。

西方文化隨着港口的開放而傳入澳門。這時候，澳門貿易港人口陡增，文化內涵大為充實。它所增加的人口主要來自兩個方面：一是葡國商人、二是中國商人。1557年澳門開埠之初，居民祇有400人。但到了1564年，據龐尚鵬稱：‘今夷眾殆萬人矣’⁸。關於澳門的人口，早期並沒有精確的統計，主要根據官員的奏稿。大體上，16世紀60年代至17世紀30年代，是澳門貿易最為繁榮時期，官員屢次報告人口總在萬人以上。17世紀中葉以後，澳門貿易已過高峰期，人口也降到祇有幾千人。即便如此，自1557年以來，澳門始終是一個華洋雜居的海港城市。毫無疑問，外國商人和中國商人在共同促進澳門經濟繁榮的同時，也共同促進了澳門文化的繁榮，從此澳門文化再也不是單調貧乏的漁港文化了。當時澳門的文化，很明顯是中國的和西方的兩種文化共存於一個地方，而各自保存其本身的特色。葡人居留澳門，目的是從事貿易，牟取財富。但他們長期居留，生息繁殖，帶來了西方生活方式：住洋房、穿洋服、吃西餐、執洋禮、說洋話、寫洋文、以及建教堂、辦學校和設醫院等等。這就給澳門帶來濃厚的西洋文化氣氛。當時澳門華人基本上仍按中國傳統方式生

4. （明）王臨亨《粵劍篇》卷3誌外夷。

5. 郭斐：《廣東通誌》卷69〈澳門〉。

6. 同上。

7. 厲式金：《香山縣誌續編》卷6海防。

8. 龐尚鵬：前引書。

活，並用驚訝的眼光注視澳門出現的西方文化，認為葡人‘詭形異服，劍芒火炮，彌滿山海，喜則人而怒則獸，其素性然也。’⁹因而特別注意多加提防。這是中國人與西方文化接觸之初所存在的一種心態。

二、中西文化的交滙融合

然而中西文化在澳門共處一地，必然互受潛移默化之影響。漸漸地便有中國人穿洋服、習洋文、進洋學堂、信奉洋教、乃至出洋留學，學習西洋科學知識；同樣，也有洋人穿漢服、講漢語、研究漢學、翻譯中國典籍等等。華洋通婚的事也時有發生。可見，澳門提供了充分條件，使中西文化相互滲透與融合，逐漸形成別具一格的澳門文化。這種融合，又是在長期共處中自然發生的。大體上，澳門的中西文化交流是通過以下幾種情況實現的：

一是中葡商人生意交往，相互溝通，進而習染文化。葡人居留澳門貿易後，東南沿海的粵、閩、浙等省商人紛紛聚集於澳門，其中尤以福建商人的勢力最大。1564年龐尚鵬稱：‘其通事多漳（州）、泉（州）、寧（波）、紹（興）及東莞、新會人為之，椎發環耳，效蕃衣服聲音。’¹⁰、《澳門記略》說：‘其商僮傳譯，買辦，諸雜色人多閩產，若工匠、若販夫、店戶，則多粵人。賃夷屋以居，烟火簇簇成聚落。’¹¹胡平運更說：‘而大蠹則在閩商，其聚會於粵，以澳門為利者，亦不下數萬人。凡私貨通夷，勾引作歹，皆此輩為之。’¹²屈大均也說：葡人‘諸船輸珍異而至，每船載白金巨萬，閩人為之攬頭者分領之，散於百工，作為服食器用諸淫巧以易瑰貨，歲得饒益。’¹³一些中國商人唯利是圖，大做走私生意，‘有見夷人之糧米牲菜等物，盡仰於廣州，則不特官澳運濟，而私澳之販米於夷者更多焉。有見廣州之刀環硝磺銃彈等物，盡中於夷用，則不特私買往販，而投入為夷人製造者更多焉。有拐掠城市之男婦人口，賣夷以取貨，每歲不知其數，而藏身於澳夷之市，劃策於夷人之幕者更多焉。’¹⁴由此可見，由於中國商人到澳門做生意，並受僱於葡人，充當實辦、通事（翻譯），工匠等等，而與葡人頻繁接觸，進而習染其文化，‘椎發環耳，效蕃衣服聲音’，也就是穿洋服、講洋語；當然葡人也有穿漢服、講漢語的。同時，葡人‘於澳門建造屋宇樓房，携眷居住，並招民人質居樓下，歲收租息。’¹⁵赴澳貿易的內地商人自然都租住這些洋房，而與葡人成為上下鄰居，朝夕相處，融洽無間，不但互相吸納習俗，甚至互通婚嫁。葡人認為東方女性純良溫順，樂於娶中國女子為妻，也很樂意把女兒嫁給中國人。他們往往因為‘得一唐人為婿，皆相賀。’¹⁶可見兩國

9. 同上。

10. 同上。

11. 印光任、張汝霖：《澳門記略》，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，1988年版，第2頁。

12. 史澄：《廣州府誌》卷222，列傳11。

13. 屈大均：前引書，第35頁。

14. 郭尚賓：《郭給諫疏稿》第1卷，第12-17頁。

15. 印光任、張汝霖：前引書，第25頁。

16. 同上，第66頁。

人民在澳門的友好相處。總之，兩國人民通過貿易往來頻繁接觸，使文化習俗相互影響，這應是澳門中西居民文化融合的一個主要的表現形式。

二是天主教的傳教活動擴大了西方文化的影響。天主教是西方文化的象徵。教會早就企圖通過傳教，使西方文化征服東方。葡人於1557年居留澳門後，即開始進行傳教活動，至1562年澳門建造了3座簡陋的教堂，共有天主教教徒600人。1567年1月23日，羅馬教皇頒佈諭旨，成立澳門教區，任命耶穌會士加內羅為主教，負責遠東地區的傳教事務。1566至1569年間，教會在澳門建造了麻瘋院、仁慈堂和白馬行醫院（又稱醫人廟），這是教會為了吸引信徒而從事的最初的慈善事業，不論是否教徒，均予收容治病，這樣就溝通了教會與民眾的關係。此後澳門的教堂愈建愈多，其中最宏偉的一所為聖保祿教堂（俗稱三巴寺）。該堂始建於1563年，分修道院和教堂兩部分，由5座相互連接的建築物組成。每當舉行宗教儀式，參加禮拜者達300人，故成為遐邇聞名的遠東教區大本營。凡澳門教士，都被視為三巴寺僧。當時寓居澳門的方顯愷咏‘澳門詩’中，有‘相逢十字街頭客，盡是三巴寺裏人’之句。¹⁷足見聖保祿教堂教士與信徒之多。

到了80年代，由於利瑪竇的努力，使中國的傳教打開了局面。清朝初年，據楊光先的報告，有30所大教堂遍佈全國大中城市，教徒達15萬左右。作為傳教基地的澳門也有教徒‘盈萬人’。並在1578年建立了華人教堂，中國稱為‘唐人廟’，這是一所華人進行宗教活動的教堂，由三巴寺的教士負責管理，用華語傳教，吸收華人教徒。根據張汝霖1746年的調查，中國人入天主教，有兩種情況：一種是住在澳門的華人進教；另一種是附近南海、番禺、東莞、順德、新會、香山等縣居民每年一次到澳門進教，關於進教與西化的關係，張汝霖指出：

‘其在澳門進教者，久居澳地，漸染已深，語言習尚，漸化為夷，但其中亦有數等，或變服而入其教，或入教而不變服，或娶鬼女而長子孫，或藉資本而營貿易，或為工匠，或為兵役。又有來往夷人之家，但打鬼辯，亦欲自附於進教之列，以便與夷人交往者。此種倏往倏來，不能查其姓名。今查得林先生、周世廉等十九人。而林先生蓄名嘸吠嘸少，住進教寺內，率其子與其徒，專以傳教為事。周世廉蓄名安哆彌咽也，又呼賣雞周，儼然夷船之主、出洋貿易、娶妻生子。此二人，尤為在澳進教之魁也。’¹⁸

很明顯的，華人進教不僅僅是對基督信仰的皈依，也是對西方文化的認同。因此天主教傳教的過程，也是西方文化在東方擴展其影響的過程。同時澳門教區當時實際上兼管着珠江三角洲6縣的傳教事務。華人受洗後，不但在澳門積極參加宗教活動，還常常陪同西洋教士進入內地傳教，充當洋教士的嚮導和翻譯，如廣東新會人鍾鳴仁、鍾鳴禮兄弟同其父一起在澳門進教後，曾先後伴隨利瑪竇、羅明堅、王豐肅、郭居靜等人傳教於廣東、江西、南京和浙江等地，又居住北京傳教六七年之久。當然文化交流總是雙方面的，外國傳教士西化了中國教徒，中國人民也漢化了來華的傳教士。這些傳教士開頭祇是為了傳教的需要而不得不學中文、講華語，竭力適應中國的風俗習慣，甚至使自己變成中國人。但當他們鑽研中國典籍，瞭解中國國情之後，便

17. 同上，第63頁。

18. 同上，第29 - 33頁。

深深地被它的悠久的歷史文化所陶醉。於是他們努力使自己成為漢學家，積極向西方介紹中國文化。因此，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教活動所造成的文化影響是雙重的：它使西方文化傳入中國，也使中國文化傳入西方。

三是洋學堂的建立與文化典籍的互傳，加大了文化交流的力度。1594年12月1日聖保祿神學院的建立，是澳門中西文化交流的重大事件。這所學院又稱聖保祿學院，中國人稱為三巴寺，它提供了良好的條件，把許多西方人培養為中國通。進而成為漢學家，同時又把許多中國人培養為通曉西學的人才。因此可以說它是遠東漢學家和西學人才的搖籃。它從建立起至1835年被大火焚毀為止，共存在241年之久，辦學經費由澳門葡商承擔。學校課程分為三類：1. 人文科——漢語、拉丁語、修辭學、音樂；2. 哲學科——哲學、神學；3. 自然科——數學、天文、歷算、物理學、醫藥學等。其中漢語為必修課程，課時最多。學生來源主要兩個方面：一是歐洲來華傳教的耶穌會士，目的是培養他們成為精通漢語、熟識中國國情、風俗與禮儀的人才，以利於傳教。二是中國和日本等東方國家的教徒，目的是使他們精通拉丁文天主教義，以便參加傳教工作，今後尚可普升司鐸。儘管學院是為了推廣天主教而創辦的。但它實際上是中西文化培訓中心。大體上說，洋人進修二年是接受漢化的過程，而華人進修二年則是接受西化的過程。

從1567年至1807年間，先後到聖保祿學院（包括學院前身修道所）進修的西方教士約有200多人，其中許多人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貢獻。他們在傳教過程中把大量西方宗教與科技典籍翻譯成中文，傳入中國；同時他們也成為中國通，把一些中國古代典籍翻譯成西文，傳入歐洲，並撰寫了一些介紹與研究中國的著作。如利瑪竇、謝務祿、衛匡國、金尼閣、湯若望、南懷仁、鄧玉涵等人，都是早期有影響的漢學家。同一時期在學院進修的中國教徒數量究竟多少，目前尚無確切統計。現有的零星資料顯示，有許多是澳門出生的教徒，如黃明沙、游文輝、徐必登、鐘鳴禮、石宏基、法類斯、鄭瑪諾等人；另外還有來自江蘇常熟的著名畫家吳歷，來自上海華亭的陸希言，以及來自河北的藍方濟等人。學員無論華人洋人，均是來自五湖四海，有老有少。其中吳歷是近50歲的老人，但大多數則是十多歲的兒童¹⁹。華人學員通過進修，懂得天主教義，掌握了外語和一定的西方科學知識，成為西學人才，他們在從事傳教過程中，翻譯和撰寫了一些著作，促進了中西文化交流。游文輝、徐必登曾參與制作《兩儀玄覽圖》，陸希言著有《聖年主保單》二卷，《億說》一卷，《周年主日口譯》鈔本二卷，以及《澳門記》等。吳歷是清初著名的詩人和畫家，著有《墨井詩鈔》、《三巴集》、《澳中雜詠》等。游文輝工於西畫，他繪制的利瑪竇像，珍藏於羅馬教廷之中。石宏基也是個油畫家，畫了許多宗教宣傳畫。

從17世紀中葉起，澳門教區又開始選拔中國學生出洋留學。這項工作一方面由聖保祿學院在學員中挑選，另一方面由傳教士在各省教中挑選，推薦至澳門教會集中培訓，再啟程赴歐。到了18世紀，被選派留學的中國學生愈來愈多。1732年7月，意大利傳教士馬國賢經教皇許可，在那不勒斯創辦了中國學院，培養遠東傳教人才。學

19. 關於聖保祿學院的學習生活，吳歷在《三巴集》中曾有生動的描述。：‘性學難逢海外師，遠來從者盡童兒。何當日課分卯酉，靜聽搖鈴讀二時。’‘門前鄉語各西東，未解還教筆可通。我寫蠅頭君鳥爪，橫看直視更難窮。’見吳歷：《三巴集》第1-4頁。《小石山房叢書》第13冊。

院不僅接納中國留學生，凡有志來遠東傳教的人均可入學修讀。該學院於1868年停辦。在其辦學136年間，先後就讀的中國留學生便達106人之多。除此之外，也有不少中國留學生被傳教士送到歐洲其他國家就讀。但由於年代久遠，人員分散多國，數字難以統計。

早期中國人出洋留學有兩個特點：第一、留學均由教會組織，學員由傳教士在教徒中選拔，留學的目的是培養華人傳教士；第二、出國留學生多數是十多歲的教童，成人學員主要是外國傳教士，中國人則祇有吳歷等極少數人。往往是虔誠的教徒自願把資質聰穎的子弟交付教士培養，以便日後為教會效勞。因此它自始至終是教會培養神職接班人的活動。但由於留學生在國外學習了大量的科學文化知識，客觀上不可避免地會由此產生一批西學人才。儘管當時已有許多人出洋留學，卻沒有在中國社會引起很大反響。因為中國史籍甚少記載，天主教會也沒有大肆宣揚，故鮮為人知。從這一點上說，它與鴉片戰爭後的留學熱潮引起的社會效應不可同日而語。不過它畢竟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。

澳門教區奉行的學術傳教方針，推動了中西文化交流，促使大量西洋文化典籍流入中國；同樣地，也促使大量中國文化典籍流入西方。早在天主教在華開教之初，利瑪竇等人為了與人談論學問的需要，總是隨身攜帶一些科學書籍供參考之用，並在教徒協助之下，把這些書籍翻譯成中文出版。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就這樣傳入了中國，同時也擴大了天主教的影響。到1613年，法國耶穌會士金尼閣向羅馬教皇報告了在中國進行學術傳教的情況。隨後以教皇的名義在歐洲募集圖書7000部，由教廷加蓋印章，作為教皇贈書、由金尼閣、傅泛際等人於1618年啟程運往中國。1620年7月22日抵達澳門。

7000部典籍中，除了宗教圖書之外，還有許多科學著作。如西人鄧玉涵與華人王徽合譯的《遠西奇器圖說》三卷，便是其中之一，屬物理類。這些文化典籍的傳入，引起中國士大夫的濃厚興趣。楊廷筠於1621年所著《代疑編》中曾說：‘自西泰利先生（利瑪竇）用賓上國，蒙朝廷生養死葬，其國主感恩圖報，特遣陪臣金尼閣遠來修貢，除方物外，有裝璜圖書七千餘部，重複者不入，纖細者不入。書籍見頓香山澳（澳門），俾一朝得獻朝廷，當必發儀部及詞林，與西來諸儒翻譯讎訂，書義昭然，茲編亦屬剩語矣。’²⁰《代疑編》寫於圖書運到澳門之後一年，其敘述翔實可靠，自不待言。楊廷筠後來為艾儒略《西學凡》一書寫序時又說，這些從西方運來的典籍，其來路之遙遠，數量之多，意義之大，遠遠超過唐代玄奘西天取來的經書。他把‘西天取經’與‘西洋送經’相提並論，說明他已充分認識到這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件大事²¹。當時李之藻也在《職方外記》序言中說：‘金子（金尼閣）者，齋彼國書籍七千餘部，欲貢之蘭台麟屋，以參會東西聖賢之學術者也。’²²此後，閱讀與翻譯這些典籍成了晚明的一時風尚。1639年李九功在《勵修一鑒》序言中說，已有100多種譯成了中文，平均每年約出版5-6種。進入清代，譯書仍在繼續。直至乾隆年

20. 楊廷筠：《代疑編》‘答西國義理書籍有萬部之多’。

21. 楊廷筠：刻《西學凡》序。徐宗澤：《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》，中華書局1989年版，第392頁。

22. 李之藻：刻《職方外記》序。徐宗澤：前引書，第315頁。

間，對天主教的禁令愈來愈嚴，譯書工作才陷於停頓。據統計，總共翻譯出版了211種西洋典籍，其中涉及西洋科學技術方面的共35種²³。基本上把西方自文藝復興運動以來的新科學、新知識，如天文、數學、地理、化學、物理、醫學、機械制造、建築學、以及宗教哲學、語言學、西洋繪畫和音樂等等，介紹到中國來，使中國士大夫為之耳目一新。從此中國學界的學術思想逐漸發生了變化，開始放棄一貫崇尚的空談理學，重視經世致用之學。同時在研究方法上，吸收了西學精密細緻的科學方法，對考據學的興起產生了直接影響。

當西學不斷向中國傳入之時，中國的傳統文化也傳到歐洲。澳門教區的耶穌會士從16世紀末便開始翻譯中國的古典經籍，以及撰寫闡述儒家學說的著作，把中國的思想文化傳入西方。1593年，利瑪竇把《四書》譯成拉丁文，寄回意大利出版，這是第一部西譯的古籍、是大學、中庸、論語、孟子的合集、後來又以單行本發行。1626年，金尼閣出版了《五經》的拉丁文譯本。該書由詩經、書經、禮記、易經和春秋合成，同樣也有單行本發行。這兩部儒家經典後來又分別出版了歐洲許多不同文字的版本。據不完全統計，16至19世紀，澳門教區有25名傳教士翻譯及撰寫了77種著作，分別介紹了中國的四書、五經、歷史、地理、兵法、醫藥等方面的古籍，以及孔子、老子、孫臏、吳起等思想家和軍事家。這些典籍在歐洲思想文化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²⁴。

總而言之，澳門文化是在澳門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形成的，是與澳門國際貿易港的形成和興盛同步發展的；通商、傳教與文化教育等多方面活動，促進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與澳門文化的繁榮。

三、澳門文化的歷史地位

綜上所說，澳門文化是中國境內最早形成、並且長期存在的一種多元文化。構成這種文化的主體是長期居留當地的中國人和葡萄牙人。但除此之外，還有前來貿易和居留的西班牙、荷蘭、英國、意大利、法國、比利時、丹麥、瑞典等西方不同民族的文化；以及還有日本、暹羅、菲律賓、馬來亞、越南、柬埔寨、印尼、文萊、錫蘭、印度、也門等東方不同民族的文化。他們從四面八方匯聚於澳門，雖然居留時間長短不一。但均能和平相處，從而使澳門成為一座色彩繽紛的多元文化的港口城市。這確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奇蹟²⁵。在澳門，各種文化都極力自我表現和擴大影響；並在互相交流中，各自吸收對方的優點和長處，以補充本身的不足，豐富本民族的文化，對於中國人民來說，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優點與長處，尤其是吸收西方的新文化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。同時文化交流的雙方，就整體而言，都能各自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色，而不至於使一方完全融合於另一方。

23. 徐宗澤：前引書，第1-15頁。

24. 參見吳志良編：《東西方文化交流》，澳門基金會，1994年版，第54-55頁。

25. 《澳門記略》對所有這些居留澳門的不同民族，曾經一一作了介紹。印光任、張汝霖：前引書第46-56頁。

澳門由於恰好處在中西文化的交匯點，它往往能夠在不同文化碰撞的基礎上，產生出一些創新和突破的舉措，對交流起着巨大的促進作用。它於1567年建立的澳門教區，是天主教遠東的傳教基地；它於1594年創辦的聖保祿神學院，是遠東的第一所大學；1645年澳門少年鄭瑪諾被選派到羅馬留學，是中國最早的出洋留學生；它早在1568年5月便設立西醫醫院，並引進金雞納霜（奎寧）等名貴西藥，以及西醫外科手術治療方法，等等。這些都是澳門引以自豪的文化史上的事件。

在長期的中西貿易與文化交流活動中，有大量西方新技術、新產品輸入澳門。當時被稱為‘西洋奇器’的物品，如玻璃製品，有：玻璃屏風、玻璃杯、壺、圍棋子、燈等，而最普遍的是各種不同形狀和不同用途的鏡子。有照射鏡、千里鏡（望遠鏡）、顯微鏡、大字鏡、照字鏡等多種。尤其是眼鏡的傳入，更使中國儒生嘖嘖稱奇，興奮驚嘆：‘西域傳奇制，昏眸得暫清’²⁶。又如鐘錶，有自鳴鐘、音樂鐘、手錶等多種，1582年經澳門傳入內地，深受歡迎，並摹仿製造。廣州其後出現修鐘造鐘業，稱為‘廣鐘’；同時在蘇州也製出了‘蘇鐘’。西洋花露水，即薔薇水，還有茶薇露，傳入澳門後，即被廣東人用本地薔薇摹仿製成土製花露水，在廣東流行²⁷。廣東人又引進茶薇，廣為種植，自製茶薇露。產於美洲的烟草和蕃薯，由美洲傳入歐洲，又由葡萄牙人傳到澳門，並迅速流傳廣東。

西方建築藝術與繪畫音樂也在澳門產生很大影響。澳門華洋雜居，住居形式，中西參混。中國人一般在平地上蓋平房居住，葡人則在高地建樓房，‘高屋飛甍、櫛比相望’，其式樣分為教堂和民居兩種。16世紀的教堂的建築具有當時羅馬教廷盛行的‘巴羅克’風格。巴羅克（Baroque）的藝術特點是莊嚴高貴、氣勢宏偉、生氣勃勃、有動態感、注重光的效果，擅長於表現強烈的感情色彩。民居多為二層以上樓房，有走廊，四面開窗，門楣多作圓拱形，紅牆粉壁，美觀大方。

西洋畫主要是宗教畫。萬曆年間，由耶穌會士羅明堅將耶穌、聖母瑪利亞肖像畫傳入澳門。後來又傳入內地，流傳甚廣。此外，其他品種則有風景畫、紙畫、皮畫、皮扇面畫、玻璃器具畫等多種。由於西洋畫注重陰陽明暗的配合，以及遠近高低的配合，人物畫‘其貌如生，身與臂手，儼然隱起幀上，臉上凹凸處，正視與生人不殊。’²⁸風景人物畫則‘其樓台宮室人物從十步外視之，重門洞開，層級可數，潭潭如第宅。人更眉目宛然。’²⁹當時傳教士畢方濟所著《畫荅》一書，論述了西洋畫的理論，對中國美術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。清代畫家莽鵠、丁允泰、丁瑜、吳歷、焦秉貞等畫家，‘作畫每用西洋法’³⁰。

西方音樂也是隨同天主教傳入中國。當時澳門教堂歌唱聖經，有風琴、銅弦琴伴奏。‘男女日夕赴寺禮拜，聽僧演說。寺有風樂，藏草柜中，不可見，內排牙管百餘，外按以囊，噓吸微風入之，有聲鳴鳴自柜出，音繁節促，若八音並宣，以合經

26. 同上。

27. 范端昂《粵中見聞》，廣東人民出版社，1991年版，第257頁。

28. 顧起元：《客座贅語》，利瑪竇條。

29. 印光任、張汝霖：前引書，第81頁。

30. 《清史稿》五〇四，藝術傳三。

唄，甚可聽。’³¹銅弦琴是一種打擊樂器，‘削竹扣之，錚錚琮琤然’³²。同時傳入的還有五綫譜和音樂理論知識。

在近代歷史上，澳門文化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個典範。它創造了文化和平相處與融合的最佳模式，對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的貢獻，因此，它的歷史地位是不可抹煞的。澳門文化的形成，直接推動了16-18世紀的第一次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。而當高潮過去後，雖然在國內其他地方，文化交流已被迫中斷，但在澳門，它却能長期地保持下去。此外，澳門文化的歷史作用，還在於它是中國人放眼看世界的窗口，不斷向中國傳送來西方的新思想、新文化的信息，使中國人大受啟迪。近代革命思潮和革命運動之在南方首先發生，與澳門長期傳播西方新文化有一定的關係。

隨着中葡聯合聲明的簽署，目前澳門正在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。繼續保持與發揚澳門文化的特色，創造更加輝煌燦爛的澳門新文化，對於維護澳門的穩定與繁榮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。

31. 屈大均：前引書，第34頁。

32. 印光任、張汝霖：前引書，第7576頁。

